

《资本论》的反贫困哲学及其新时代价值*

周露平

【内容提要】 超越贫困，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重大事件，直接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预期”与“实现质量”。澄清现代贫困的成因，直接关系反贫困的实际效果。《资本论》以唯物史观视角澄清了贫困的现代性起源，确认它根源于资本的生产积累制度，并导致诸如工人贫困、生态贫困、精神贫困与全球贫困等四大贫困问题。因此，若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必须回到《资本论》，因为《资本论》是在超越资本的原则高度上消灭贫困，实现人类解放。《资本论》的反贫困哲学对于新时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即从历史高度明确了新时代需要市场经济，它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社会物质财富；同时，又明确指出需要扬弃市场经济、超越资本，实现中国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 《资本论》 反贫困哲学 相对贫困 经济哲学 绝对贫困

作者简介：周露平（1980-），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 212000）。

超越贫困，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并直接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预期”与“实现质量”。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实现反贫困的历史重任，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资本论》作为反贫困哲学的辉煌巨制，需要不断被深入挖掘，这将有助于为新时代提供反贫困的思想引导与理论资源，扬弃那些反贫困的实证主义路线与伦理主义批判。

一、澄清前提：贫困问题的症结与规律

前资本主义社会对贫困的反思是碎片化的，这显然受制于“宿命论”与“神授论”等神意框架，故无法上升至系统化的批判层面。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来，贫困议题才真正得以科学澄清：贫困是现代工业生产的结果，而绝非前提。英国学者布斯和朗特里最早开始研究工业化社会的贫困问题，并提出社会贫困工业起源的问题。他们的思考方式引发了后来学者的不断讨论与争议，但这些学者没有真正澄清导致贫困的社会前提。因为这些讨论要么回到操作性的技术层面，要么回到道德领域或人性论的批判空间。纵观马克思的思考，他并没有停留于减少贫困、帮扶贫困或减轻贫困等社会操作层面，而是从私有财产和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提出消灭贫困的人类解放议题。因此，反贫困的终结议题只能回到马克思，回到《资本论》。

1. 前提失范：西方学者解读贫困问题的研究偏好与理论性质

纵观思想史，很多哲学家表现出对贫困问题的兴趣。就思考的线索而言，古希腊哲学已萌芽出了为城邦人民提供幸福与富裕之路，也为现代财富的思想起源提供时代坐标的思想火焰。它直接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论域与理论效应”（18FZX024）与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资本论》第二手稿的理论地位与哲学思想”（18ZXB004）的阶段性成果。

活了这样的历史性命题：财富不仅与掌握财富者发生关联，同样与失去财富的贫困者有内在关系。那么，可做追问，特定社会成员的贫困现象是神定的还是人为的？围绕这样的追问，古希腊哲学自开始就是哲学思考与经济学生成的“合二为一”：一方面就起源而言，哲学与经济学是寻找能够促进人类富裕与福利的手段，这就潜在地包含对贫困的超越；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处置已创造出的财富，彰显出财富的共享路径何以系统性生成。如色诺芬的《经济学》将经济学看成家庭管理的艺术，以防止家庭陷入贫困，亚里士多德将反贫困问题提升至物质财富的具体维度。他诠释了财富生产如何从家庭空间走向公共领域，即贫困生成思考不仅局限于家庭本身，而应拓展为社会性的结构系统。

近代以来的哲学家对贫困问题同样作出了回应，主要是从所有权批判出发，聚焦两大路径：其一，以抽象的法权关系批判社会贫困现象。如蒲鲁东认为，所有权是盗窃^①，它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提出了抽象法权意义上的劳动正义，即“正义是位居中央的支配着一切社会的明星，是政治世界绕着它旋转的中枢，是一切事务的原则和标准”^②。蒲鲁东尽管抓住了导致贫困问题的现代内容即所有权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鼓动性；但解决方案却从抽象的法权关系出发，而未真正进入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关系。因此，当提出诸如“特权的消灭，奴隶制的废止、权利的平等和法律主宰一切”^③时，他仍立足于小资产阶级的保守立场。其二，从自然主义视角对现代所有权的批判。如卢梭融合了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等人的观点，他从平民主义视角提出了贫困问题的超自然主义起源，认为社会进步与人民贫困是同步的，即所有权导致了财富和地位的极端不平等，制造了大量贫困人口，“保障私有制和不平等的法律却永远固定下来，这种法律将富人的巧取豪夺变成一种不可变更的特权”^④。卢梭赋予贫困问题以浪漫主义诠释，试图以自然主义原则批判世俗化内容，但他并未理解这种世俗化起源，进而无法抵达所有权背后的历史视野。

那么，近代以来的经济学家又是如何界定贫困与富裕的呢？他们主要从国家的整体性视角加以界定。换言之，经济学要为国家富裕做制度设计。如重商主义者直接以实体化货币的储量来区别贫富，将货币的使用方式与贫困成因直接结合，开启了贫困研究的经济哲学视角。重农学派认为贫困问题形成于农业收入的纯产品的多寡。他们将土地生产物看作财富及收入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那么丧失土地的农民必然贫困。亚当·斯密从社会秩序的维度优化了自然秩序的理解，并认为这种秩序比人为形成的秩序要有效，那么贫困问题作为整个自然秩序设计的“灰色地带”，可以忽略不计。李嘉图经济学家则明确将这种自然秩序科学化经济学规律。总而言之，近代西方经济学家为资本征服世界寻找理论支撑，完全忽视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现实问题。

尽管还有很多现代西方学者关注到世界贫困问题，但由于理论限制与阶级立场等原因，只是提出了贫困问题的外部批判——诉诸道德评价、经济起因、社会分工、个体天赋等社会不平等，由于篇幅限制，就不一一阐述。总之，他们的理论研究侧重于将贫困问题作为社会的边缘现象，并未提高到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

2. 哲学矫正：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澄清了社会贫困的异质性内容

对于这种作为社会系统性病症的现代性贫困，经济学阵营出现过“人本主义”的内部反思，西斯蒙第就是典型代表。他对贫困问题有过科学的判断，假如一个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处于贫困，“即使上层阶级获得至高无上的人类幸福，充分发挥一切才能，享有一切公民权利，极尽人间乐事，

① 参见〔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8页。

② 〔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2页。

③ 〔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页。

④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高修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62页。

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①，进而他提出了经济发展是为人还是为物的“悖论”。这种悖论的揭示直接浸淫着人本主义批判，很容易滑向人性论批判。可见，西斯蒙第的反思并没有真正澄清社会的贫困问题。

与这些思想家相对，马克思对现代贫困批判是超越人本主义的道德设置的，他直接从社会形态的整体性维度澄清了现代贫困的核心本质，与他们划清了理论界限。马克思通过对三大社会形态的批判性解读，澄清了现代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关于导致贫困方式的本质区别，为现代贫困提供了准确定位。在马克思这里，第一个阶段是指以人的依赖为内容的前资本主义时期，极端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绝对贫困。由于社会财富无法满足社会大部分成员的需要，那么普遍性贫困标识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第二个阶段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以物的依赖为内容，造就了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相对贫困。随着现代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发展，导致贫困的手段与方式反而成为现代社会控制劳动力的基本设置，表现为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维持生存异化与控制社会生产的基本途径。换言之，必须保持社会大部分群体的贫困，使之从事强迫性劳动（谋生劳动），贡献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才能推动资本积累。那么，现代性贫困转换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物（包括商品、货币与资本）成为贫困问题的根本前提，统治阶级通过控制“物”来维持社会大部分成员的相对贫困。第三个阶段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阶段，这是对现代私有财产制度的扬弃，形成超越现代性贫困的路径，整个社会消除了私有财产对贫困内容的控制，即人自由掌控物质力量，形成了自我超越的全面发展，进而超越贫困。

由此，马克思开始对第二大社会形态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类整体性超越贫困之可能。他的首要任务是，以唯物史观视角分析第二大社会形态的贫困问题。其一，贫困形态的变化。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就提到，除了工业生产转化而来的无产者，还有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民族的农奴，他们共同组成了德国贫困者的阵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那么，这种无产者的贫困形态具有鲜明特性，即“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②。换言之，现代工业与现代资本造就了新型贫困者。其二，贫困内容的提炼。《资本论》详细考察了剩余劳动的占有情况，以说明贫困内容的特殊性。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对产品的使用价值的占有，因此贫困本身表现为生活资料的无限缺乏；资本主义社会是对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渴求，表现为对剩余劳动的无限贪欲，那么资本主义的贫困就表现为无产阶级的无酬劳动被资本家占有而贫困，这是资本社会的贫困内容。

3. 面向资本：唯物史观澄清了贫困问题的现代性起源

近现代思想家反贫困视角偏重于诸如“天赋贫困说”“机会致贫说”“生存恶化说”“制度剥削说”“人口过剩说”等，而与之相对，马克思澄清了这样的现实——这些理论家们直接以私有财产作为合法性前提，但并未对私有财产本身（诸如它的产生、运动及消亡等）加以批判性说明。由此，马克思与他们走向了不同的批判道路，并彰显为两大理论任务：一个是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即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另一个是私有财产的当代表现，即现代私有制的内容问题。第一个理论任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以明确，私有财产起源于异化劳动即谋生劳动，是谋求生活资料的劳动，“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③，这种谋生劳动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那么贫困的起源问题就转化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

① [瑞士]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9-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这种非现实化表现为工人不断丧失对象化生产出的产品、过程与本质，即“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①，贫困就是异化劳动所导致的，那么异化劳动的根源是什么？《德意志意识形态》认为是自发分工形成异化劳动。显然，自发分工无法从社会经济关系支撑起这样的论证，进而马克思提出了第二个理论任务，即《资本论》及其手稿提出异化致贫的原因规律与运行机制，成为唯物史观诠释走向《资本论》批判的核心内容。换言之，唯物史观尽管提出了异化导致贫困的诠释思路，但需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异化现实加以科学解剖，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

二、划清界限：《资本论》反贫困的哲学谱系与理论实质

《资本论》提出，在现代资本运动的特殊规律下，资本与劳动的对峙必然导致贫困；要想解决贫困问题，必须超越资本。在这样的理论高度与实践向度上，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划清了原则界限。《资本论》第一次系统性地梳理了“无产阶级贫困”的社会根源：一方面，从经济学批判的视角，科学分析资本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性贫困；另一方面，从哲学批判的维度，阐述了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权力，加大对被剥削者的剥削，制造社会结构性贫困。

1. 世界贫困与资本生产的“彼此建构”

诠释与解决世界贫困难题，必须回到《资本论》。《资本论》以“剩余价值”为核心，交代了无产阶级的贫困根源。这是“一体两面”的表述：一体是资本生产，两面是资本的剩余价值获取、无产阶级的强制贫困。具体而言，现代资本维持着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目的是让无产阶级不断进入资本生产系统，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剩余价值，完成资本积累。就此而言，贫困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发性力量”，并拓展为全球性效应。第一，现代世界因何贫困？资本导致贫困。《资本论》准确聚焦现代致贫的核心内容：雇佣劳动与工业资本的关系问题。资本改造世俗世界，将封建农民等转化为保障自我增殖的贫困人口，源源不断为自己提供增殖的劳动力。第二，世界为何要保持贫困？劳动贫民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劳动贫民”出现在英国法律之中时，基本框定了无产阶级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从卡耳佩珀、乔·柴尔德等到亚当·斯密、伊登等完成了这个词语的使用过程。这些思想家对这一概念的不断确认，真实再现了资本世界通过剩余价值系统塑造符合资本生产的劳动贫民的过程。第三，世界性贫困有何作用？建构资本统治世界的时代。《资本论》交代了资本生产过程，资本是通过两大手段控制工人的贫困（相对剩余价值与绝对剩余价值）、特别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阶段，资本通过机器自动化生产排挤工人、通过产业资本循环不断吸附工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吸附工人等。简言之，资本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世界性贫困，完成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全面控制，形成了一个资本统治世界的时代。

进而，《资本论》拆穿了劳资平等的“虚假镜像”，直接指明贫困问题始源于资本的剥削机制。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科学论证了贫困及伴之而来的阶级斗争，详细考察了世界贫困与资本生产、资本积累的内在关联。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关注到工人的绝对贫困即“最低工资”的内容，“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贫民，是这种单独存在的、与物的条件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②，他将贫困直接限定在生活资料的范围；后来的《资本论》发展与深化了这样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页。

判断，即对生产资料的资本生产的批判。

2. 资本生产积累与四大贫困的“一脉相连”

《资本论》的反贫困哲学指认，资本主义现代生产积累形成了难以克服的“四大贫困问题”，而这些贫困问题必然导致资本灭亡。第一，权力建构与工人贫困的“错位发展”。《资本论》从无产阶级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出发，明确了这样的“贫困现实”——资本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进而控制工人的生活资料，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建构：一是失去生产资料的“绝对贫困”，劳动者绝对从属于资本；二是失去生活资料的“相对贫困”，这种相对贫困不是不贫困，而是这种贫困程度与广度是受资本生产调节的，以“相对过剩人口”为载体——资本形成的权力结构不断通过生产资料的调整，进而控制工人的收入与剩余的程度。除此之外，《资本论》从多个层面提到了资本权力与工人贫困的内在关联。以机器生产为例，资本权力通过机器自动化形成了控制工人的系统，即机器是资本权力的具体展示。一方面，机器取代并驱逐工人，目的是不断减少工人的生活资料，将之转化为资本，并创造出无限延长工作日的新动机；另一方面，机器排挤工人，将之转化为相对过剩人口，“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入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可供资本主义剥削支配的劳动力的数量”^①。因此，机器自动化是资本权力的延伸与强化，扩大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内涵与外延。这种贫困不仅表现为无产阶级生活资料的匮乏，还直接塑造了维持资本统治的结构化内容，并深嵌社会生产系统之中，变成了通过贫困方式控制无产阶级的社会权力。

第二，资本控制与生态贫困的“内在关联”。人类和地球的“全面商品化”，被资本吸附为自我增殖的内容。一方面，资本控制导致了自然的附庸性。当海德格尔的资本批判提升至人类学视阈时，现代科技不断用理性原则塑造与改造自然，完成“资本控制世界”的过程。那么，资本不断将自然界作为生产的元素，加快了自然的合理性过程。《资本论》详细讨论资本如何控制自然的过程，那么自然不断附庸于社会系统，接受资本的规训，因此自然规律被表述为资本积累规律的一个内容。另一方面，劳动异化（雇佣劳动）决定了自然异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来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资本破坏自然的初步论断；而《资本论》详细考察了劳动异化如何转化为自然异化。以土地破坏与生态恶化的关联为例，土地本来是人类生存的环境与人类交往的环节，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利用土地的方式发生了转换，即从获取生活资料转换为生产资料时，不断侵害与掠夺土地，破坏了生态环境。人类的有机变换的“新陈代谢”过程被打断，即新陈代谢断裂。如，李比希所言的“土地衰竭”的表现，《资本论》第3卷论述资本主义地租时说，大土地所有制使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②，《资本论》第1卷“大规模的工业和农业”也有论述。再比如，1868年3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批评弗腊斯对于生态贫困的误解，直接证实是现代资本造就了生态恶化，而不是弗腊斯所言的生态恶化是由于自发性的土地耕作的错误判断，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说，“可见，他也具有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③。这些都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通过机器技术不断对自然加以破坏。

第三，经济意识与精神贫困的“现实生成”。《资本论》重点考察了现代拜物教现象，它是现代生活世界的经济意识。这种经济意识不断生成经济合理性的内容：一方面，改造了劳动者对于自我存在的理解，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的智力与体力的分离。经济意识由于机器自动化的介入，极度损害了无产阶级的精神系统，夺去劳动者任何反思的可能；另一方面，生成了智力衰退的社会固化功能。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7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3页。

货币化生存世界促进人类的契约精神、自由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同时，还体现为资本对剩余劳动的剥削，不断突破着道德与身体的制约，“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①，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贫困。马克思引用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中的内容，论证了无产阶级精神的贫困状态，如童工的道德败坏、少女工人的道德沦丧、制砖工人的道德堕落等^②，这些导致了整个社会以“智力的荒废”为内容的精神贫困。

第四，资本积累与全球贫困的“互为因果”。资本生产的目的就是控制全球，维持世界贫困。因此，从传统社会向资本社会的过渡时期，现代剩余价值的增殖机制改变了传统贫困状态，造就了全球性的贫困现象。西方国家从早期赤裸裸的对外战争与征服殖民，到现代更为隐蔽的软性殖民方式，如文化殖民、金融殖民、意识形态殖民等，体现出资本主义整体性、系统性、彻底性控制无产阶级的过程。整个世界出现贫困状态，体现为整个世界都在服务于资本生产，为资本提供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与世界资源，如劳动贫民的国际化流动、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市场机会的制约等。有一种误解认为，由于时代变迁，《资本论》已不足以揭示当代的发展问题，那么《资本论》所涉及的“反贫困哲学”的理论构想显然也是“过时的”；甚至有学者将之看作关于无产阶级的虚构神话，“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事业的核心；存在着一个以无产阶级概念为中心建构起来的虚构的马克思主义神话”^③。诚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福利化社会，无产阶级的贫困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些高福利政策模糊了剩余生产与消费生活之间的界限，但只要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仍然存在，无产阶级的贫困依然存在，那么马克思的反贫困哲学就依然有效。

3. 反贫困与超越资本的“息息相关”

反贫困与超越资本的“息息相关”，这是《资本论》反贫困哲学的理论实质。首先，反贫困不能停留于资本批判的外观形式。从表象上看，很容易抓住资本批判的两大抓手：一个是工作日，一个是机器。但马克思并未停留于简单的机器批判或工作日分析，而是详细诠释了资本的工作原理：资本通过工作日完成了相对剩余价值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断压低工人的生活资料，以强迫工人不断进入资本生产系统；工业生产的机器系统使资本扩大了控制工人的权力，消灭了工人贫困的道德界限与自然界限，创造了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因此，资本是从两大内容上控制着工人贫困的：一个从时空上规定了工人的活动范围与生产内容，一个以隐性权力控制了工人的生产强度。所以，假如紧紧围绕工作日或者机器进行政治斗争或经济斗争，不可能真正切入资本致贫的本质，故必须回归资本批判的道路。但在这个问题上，很多思想家走进了死胡同，奈格里的判断颇具代表性。他认为生产危机引发阶级斗争，那么将阶级斗争的表象压缩为危机的内容，“危机和阶级斗争是如此深切地连接在一起，以至于在对抗性的辩证法的范围内，首先采取灾难的形式，其次采取共产主义的形式”^④，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在他看来，危机仅仅是工作日延续或机器生产的表现，显然未深入资本的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视阈。

其次，反贫困必须与资本生产积累密切相关。封建社会是等级贫困，现代资本主义是生产积累的贫困。《资本论》专门介绍了这种积累贫困的起源。资本通过积累形成征服世界的动力，但资本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6页。

②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的“现代工场手工业”部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2-534页。

③ [英] 罗纳尔多·蒙克：《马克思在21世纪》，张英魁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4页。

④ [意]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榕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的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它源于资本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导致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种生产过剩导致资本积累出现了贫困积累，这种贫困积累将危机转嫁给工人，导致工人日益贫困。因此，资本积累过程其实就是资本控制与调节相对过剩人口（无产阶级）的过程，“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①。那么，社会贫困问题的产生根源就是资本积累，它必须要保持社会生产阶层的失业状态，即保持贫困，这样才能为现代资本提供劳动力商品，“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②。由此，这种资本积累的方式，造成了无产阶级积贫积弱的现状，那么反贫困就必须回到对资本的批判。

最后，超越资本才能真正完成反贫困的历史重任。由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必然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这种否定性主要体现为：第一，资本积累贫困与无产阶级贫困同时发生。资本积累塑造出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即无产阶级由于资本积累，沦为庞大的“相对过剩人口”；同时，由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剩余价值的实现困难，因而无产阶级贫困又反过来制约着资本扩大再生产，导致资本积累贫困。尽管后来如斯威齐、巴兰以“经济剩余”取代“剩余价值”，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剩余的积累过程，而不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剥削之上——用经济剩余规律解释资本生产危机与工人的相对贫困等问题，容易将问题转换为资本家内部的斗争，完全抛弃了对无产阶级贫困的论证^③，因为产业工人的数量急剧萎缩，无产阶级贫困群体就可忽略不计，就会得出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答复——工业无产阶级必须最后起来革命，推翻它的资产阶级压迫者——不再具有说服力”^④；第二，资本积累受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制约。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必然导致一般利润率下降，即导致利润与剩余价值的相对减少，那么扩大化再生产的困境使资本积累难以为继，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⑤。因此，这两点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需要从本质上加以超越，才能消除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才能完成反贫困的历史任务。

三、切中现实：《资本论》的反贫困哲学对于新时代反贫困的辩证论域

一切关于贫困的解决方案，假如离开私有财产批判或资本批判，只能是关于贫困的表象批判，而《资本论》揭示了被私有财产制度所遮蔽的贫困实质。这些思考对于新时代中国“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小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实践价值。尽管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依然是建立在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之上的。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不能停留于生活资料本身，而是要对生产资料归属加以原则性说明。那么，市场经济只有被限定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内，才能真正完成新时代的反贫困任务。

围绕中国反贫困的现实实践与未来愿景，可分为现实运作论与历史本质论两大维度：前者表现为对新时代中国反贫困路径的当下理解，后者则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及实践愿景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3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2页。

③ 尽管他们看到了资本新时代如何通过金融资本对工人进行剥削，但是并未上升至资本对劳动的阶级斗争的高度上，从而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降低至资本家围绕经济剩余的争夺矛盾。具体参见，“关于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的最本质的东西，在这个替代中获得了它的理论表现”，参见〔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74页。

④ 〔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342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8页。

定位。

1. 现实运作论：新时代的现实境遇

中国高质量的发展态势证实了，只有通过发展与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取得社会财富的极大发展。但是，要严格区分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运用：前者是在一般意义上认识市场经济的功能，后者体现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与确定好市场经济的活动范围。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辩证统一。资本主义通过市场经济模式扩大了物质财富的生产速度，使整个地球财富绝对地增长；但同时相应扩大贫困范围的边界，使相对过剩人口严格框定在资本受益之外。换言之，资本带来的不是全球性的富裕，而是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因此，我们利用市场经济时，要将其功能发挥严格限定在资源配置层面，以防止它对社会机体的无限入侵，防止出现无法解决的“四大贫困问题”。因此，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宏观调控中协调好市场经济与人民发展之间的关系，即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到防止人民受到“利润至上”与“市场崇拜”等的伤害，使新时代的人民真正享有“美好生活”。如三农问题，农村发展在大工业的生产带动的同时，还要不断修复土地损害，这需要政府作用的合理介入，做好政策指引与科学指导。换言之，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的实质就是在政府的指导下，在重点扶植农村发展的同时，做好农村生态保护工作，纠正市场配置资源的诸多问题，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另一方面，新时代反贫困问题不能仅做“减法”，还要做“加法”。《资本论》的反贫困哲学已经明确现代贫困是结构性贫困，同时又是系统性贫困。这种贫困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变得复杂多样，不再仅表现为生活资料获取的贫困形态，即收入的简单定位，更扩展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诸多限制，如“教育机会贫困”“环境生态贫困”“精神文明贫困”“个人再发展的贫困”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利用市场经济，更要利用国家宏观调控的加法统筹，目的是为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系统性、工程性、复杂性与多元性的反贫困手段。国家从宏观层面通过社会调节方式获取劳动产品的同时，通过社会劳动时间来计量劳动产品，规定社会财富合理分配与流通。那么，反贫困表现为，国家通过顶层设计对市场经济的规定，协同与规范劳动产品的社会化流动，使人民共享社会财富，全面实现小康。

2. 历史本质论：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

历史本质论是从历史发展向度上，科学预见中国未来要走的道路，即扬弃市场经济、超越资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就理论诠释而言，必须回到《资本论》，汲取丰富的反贫困思想。《资本论》提出反贫困不能限于道德批判或哲学批判的范围，应采取政治经济学批判。故要严格反对伦理反对派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贫困问题只是由于市场经济参与者的“不道德”引起的；《资本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对社会利益问题展开了追问，同时提出超越贫困的现实诉求，即经济发展的归宿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超越贫困。那么政治经济学批判聚焦为，中国反贫困问题应该回到对经济现状的哲学反思，即直面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为人民的还是为财富的。显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归宿需要解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出人民自由发展的根本诉求。

另一方面，从实践维度来说，超越资本是反贫困的根本路径。资本或现代私有财产制度是现代贫困的根源，那如何超越资本及其逻辑，直接关系中国社会的发展未来。具体而言，第一，坚持共产党领导。共产党人的实践任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超越资本，实现反贫困的双重诉求：利益诉求方面，共产党人是反对资本最为坚决与最有力的领导，代表着无产阶级整体的利益诉求；消灭私有制

方面，共产党人能够从历史发展道路角度把握现代性发展的条件与进程，预测人类发展的未来，“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①。第二，人民必须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美好生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运用，仅仅体现为社会资源的组织形式与生产机制等功能，而不能凌驾于社会制度之上，即整个社会生产的剩余劳动，必然通过多次分配方式返回给人民，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服务人民、发展贡献人民、发展惠及人民，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第三，最为根本的归宿是扬弃市场经济、超越资本，才能真正实现反贫困的重任。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就是自我增殖，集中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利润”^②，是以剥削或剥夺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为内容。那么，反贫困直接表述为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其路径是消灭雇佣劳动与资本^③，从社会生产方式的维度超越这种致贫的社会关系，同时还要反对英法社会主义者（如霍吉斯金等）“要资本、不要资本家”的错误论断。因此，未来社会的反贫困维度在于实现全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消灭一切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剩余劳动，致使大部分社会成员贫困的现象。

总之，《资本论》的反贫困哲学为中国新时代的社会建设及其发展愿景提供了强大的理论资源与实践依据。一方面，《资本论》的反贫困哲学，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内容——要充分利用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资本论》提出要“重建个人所有制”^④，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超越资本，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源，实现人类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2]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3]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4] [英] 锡德尼·维伯、比阿特里斯·维伯：《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秋水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5] [德] 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6] [英] J. A. 霍布森：《财富的科学》，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7] [英] 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编辑：刘 影）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0页。

③ 关于消灭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讨论，参见周露平：《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6期。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页。